第一章　先秦时期的山东小说

先秦是中国文学的源头时期，也是中国小说的源头时期。关于小说的起源，鲁迅先生 1924 年 7 月在西安讲授《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时就讲过：“在文艺作品发生的次序中，恐怕是诗歌在先，小说在后的。诗歌起源于劳动和宗教。 …… 至于小说，我以为倒是起于休息的。人在劳动时，既用歌吟以自娱，借它忘却劳苦了，则到休息时，亦必要寻一种事情以消遣闲暇。这种事情，就是彼此谈论故事，而这谈论故事，正就是小说的起源。’① 但这只是一种推测，并无文献依据。想上古先民，既无录音之具，又乏速记之方，且文字产生远迟于语言，所以“彼此谈论故事”，只能是口耳相传，不可能是书面文学作品。“文字产生以后，用以记事记言，就可产生散文。因此散文的出现也甚早。’② 早期的文字，如甲骨文、金文等，虽然有的也记载了上古时代的占卜、祭祀等内容，但大都十分简短，缺乏文学尤其是小说的形象性。《周易》中的《卦辞》和《爻辞》虽有些地方记载了上古时代的战争、祭祀甚至远古风俗，但从小说文体概念的视角看，仍嫌简单，仍缺乏生动的

①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6 年版，第 270 页。
②褚斌杰、谭家健主编：《先秦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7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描述和形象刻画。

伴随着《尚书》等历史文献的编纂，伴随着以孔子为代表的一代伟人聚徒讲学和对历史文献的编纂整理，先秦文学史上逐渐出现了《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散文和《论语》、《孟子》、《墨子》、《庄子》、《晏子春秋》等诸子散文。其中的许多篇章记录了自上古以来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历史故事，有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和典型环境，具有了小说文体的萌芽，孕育了后出的小说文体。

每一位了解先秦典籍的人都清楚，隶属于儒家文化的《尚书》、《春秋》、《左传》、《国语》、《论语》、《孟子》,隶属于墨家的《墨子》，隶属于诸子散文而又以叙事为宗的《晏子春秋》等，其作者均为当时的鲁人或后来的齐人，均为齐鲁文化的范畴。正是这些伟大的著作，奠定了齐鲁文化、齐鲁文学的基石，孕育了后来的山东小说。

第一节　《春秋》、《左传》与山东小说

一、《春秋》与山东小说

《春秋》是儒家主要经典之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史书。中国自古重视历史，所以很早就有用文字记载的历史著作。《汉书·艺文志》称上古“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①]。那么为什么叫《春秋》呢？究其命

①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二十五史》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64 页。

名之义，略有三种说法：一种以《公羊传》为代表，唐徐彦疏曾引《三统历》说：“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中，万物以成，故名春秋。”① 即《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赏以春夏，刑以秋冬”二语之义，谓“春秋”二字，暗寓褒贬，颇为牵强。一种认为记孔子作书之时。《公羊传疏》曾引《春秋说》曰：“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作《春秋》，九月书成。以其书春作秋成，故云《春秋》。”② 颇有道理。影响最大的是第三种说法。杜预《春秋左氏传序》曰：“《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③ 也就是说，春秋之义有二：一为鲁史记之旧名，一为举四时之二以示为编年体例。《春秋》为鲁国史书的旧名，早有这种说法。《孟子·离娄下》曰：“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④ 《左传·昭公二年》记晋大夫韩宣子聘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可见在孔子之前鲁国的史书即名《春秋》。另《公羊传·庄公七年》在解释“星霣如雨”时说：“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⑤ 可见“不修《春秋》”即未经孔子加工整理过的鲁国旧史《春秋》。既为鲁国史书，自然为齐鲁文化的开山之作。其实不但鲁国，

① ② 徐彦：《春秋公羊传疏》，《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2195 页。

③杜预：《春秋左氏传序》，《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1703 页。

④《孟子·离娄下》，《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 1980年版，第 2728页。

⑤《公羊传·庄公七年》，《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 1980年版，第 2228页。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史书都可称“春秋”,《国语》、《汲冢琐语》、《墨子》等古籍中就有“夏殷春秋”、“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及“百国春秋”等。而今天隶属于诸子散文的《晏子春秋》、《吕氏春秋》等,则显然受其影响。其中的齐、鲁之“春秋”,无疑属齐鲁文化的范畴。

今传《春秋》的作者,一般认为是孔子。最早持此说的当首推孟子,其《孟子·滕文公下》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① 又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亦曰:“孔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殁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迄哀公十四年,十二公。”② 其《太史公自序》也说:“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当今学者经过考证,认为“较为传统的说法是,孔子及其弟子曾经对‘鲁春秋’作了一定的删改,修正其中的谬误,提炼其文字,并按照统一的体例进行了加工,最终使它成为一部典范的编年史著作。”③

《春秋》对后世小说的影响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

1. 内容和题材。《春秋》记载了春秋时期自鲁隐公元年(前 722 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 482 年)之间,发生在鲁国及周王朝、周王朝其他诸侯国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如国家重要

①《孟子·滕文公下》,《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2714 页。

②司马迁:《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二十五史》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28 页。

③褚斌杰、谭家健主编:《先秦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84 页。

的祭典、盟会，帝王将相的丧葬、嗣立，各诸侯国之间的外交活动及战争等等。尤其是战争，《春秋》所记 242 年中就有大大小小的战争 700 多次。《春秋》是儒家重要经典，当时就是贵族子弟日常学习的主要课程。孔子教授弟子，《春秋》为“六艺”之一，是重要的历史教科书。战国已大行于世。至汉，更列于学官，成为教育经典“五经”之一，一直延续到“五四”之前。以至于司马迁都说过“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① 这样，《春秋》便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但影响了历史散文，也影响了由历史散文为主要母体孕育的中国传统小说。通观一部中国小说发展史，最早具有小说性质的《穆天子传》、《汲冢琐语》，最早的笔记小说《西京杂记》,最早的史传小说《燕丹子》、《东方朔别传》,最早的传奇小说《飞燕外传》，最早的话本小说《五代史平话》、《全相平话五种》，最早的章回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等，从内容和题材方面看，无不属历史散文的范畴，显然受《春秋》的影响。

2. 编年史体例。《春秋》记事，基本上是以年月日为顺序记载历史事件，即以某年、某月、某日在某地由某人参与某事的格式叙述。如开篇第一章隐公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冬十有二月，祭伯

①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二十五史》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358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来。公子益师卒。”60 字而记述 7 事，言简意赅而清楚明白，虽然是提纲式的，但对后世影响极大。不但《左传》、《汉纪》、《后汉纪》、《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等编年体史书直接承其体例，不但《三国志通俗演义》、《东周列国志》等历史演义小说受其影响，就是《金瓶梅》、《红楼梦》等世情小说亦间接受其影响，明显地具有编年体的特点，按照自然时间的顺序依次叙写，只不过叙事由简要变为详尽而已。

3.“春秋笔法”，亦即微言大义、暗寓褒贬的叙事特征。《左传·成公十四年》于“九月，侨如以妇姜氏至自齐。舍族，尊夫人也”后面称：“故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① 已注意了《春秋》的这一叙事特征，当是我国最早的叙事理论。如上所述，《孟子·滕文公下》所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恐亦根于《春秋》的这一叙事特征。晋杜预《春秋左氏传序》更解释《左传·成公十四年》的上述话说：

> 一曰微而显，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称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缘陵”之类是也。二曰志而晦，约言示制，推以知例，“参会不地”、“与谋曰及”之类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从义训，以示大顺，诸所讳辟、璧假许田之类是也。四曰尽而不污，直书其事，具文见意，“丹桓、刻桓”、“天王求车”、“齐侯献捷”之类是也。五曰惩恶而劝善，求名而亡，欲盖而章，书“齐豹盗”、“三叛人名”之类是也。

①《左传·成公十四年》，《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1913 页。

而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第十六》则更为明确地论述这一特征说：

> 自平王微弱，政不及雅，宪章散紊，彝伦攸敚。昔者夫子闵王道之缺，伤斯文之坠，静居以叹凤，临衢而泣麟，于是就太师以正雅颂，因鲁史以修《春秋》，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

至蒋伯潜《十三经概论》，则直接说："盖《春秋》之有褒贬，是'经'之法，其旨不在记实事，而在'借事明义'，是主观的而非客观的。"① 《春秋》之后，不但历史散文"立义选言，宜依经以树则；劝戒与夺，必附圣以居宗"②，即"史氏流别"的小说亦承其雨露，具有了这一特征。关于这一点，相信凡具中国小说史常识的人都非常明白。不要说《三国演义》等历史演义小说，即使是以言情著称的《红楼梦》也不例外，刘铨福便称："《红楼梦》虽小说，然曲而达，微而显，颇得史家法。"③

4. 精练准确，丰富谨严的语言特色。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④。即指其推敲的精确程度。如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一句，《左传》便解释说："段不弟，故不言弟 如二君，

①蒋伯潜：《十三经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453 页。

②刘勰：《文心雕龙》第十六《史传》，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08 页。

③清刘铨福：《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跋》，转引自《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中华书局 1963 年版，第 38 页。

④司马迁：《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二十五史》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28 页。

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虽然只有六个字，但准确清楚，寓意深刻。褚斌杰、谭家健主编的《先秦文学史》从词语的运用方面论述《春秋》的语言特色说：

> 《春秋》中词语的选用是极为严格的。以书中的动词为例：盟、会、遇；卒、薨、崩；如、奔、逊；杀、弒；筑、城，各组近义词的含义皆有细微的差别，用以区分同一行为中不同的社会内涵及作者的评价，或区别人的等级。

由此可以想见，上述“春秋笔法”，与这一语言特色是密不可分的。这一语言特色不但影响了后世中国历史散文的传统语言风格，影响了古代散文的语言特色，也影响了中国传统小说尤其是文言小说的语言特色。不要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搜神记》、《世说新语》,即清代的《聊斋志异》亦不例外。

当然也应该指出，《春秋》记事过于简单，以至简到使人很难通过文字了解历史事件原貌的程度，更不用说故事情节的具体生动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了。然而也正是这一点，同样影响了后世小说尤其是笔记小说的创作。志怪类笔记小说的代表作《搜神记》开章第一篇《神农》云：

> 神农以赭鞭鞭百草，尽知其平毒寒温之性，臭味所主。以播百谷。故天下号神农也。

叙事之简，后世少见。《搜神记》的作者干宝史称有“良史”之才，王导即曾上疏建议干宝领国史①。《春秋》为史家重典，

①《晋书》卷八二《干宝传》，《二十五史》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495 页。

干宝不能不受其影响。其他笔记小说中亦不乏此类作品，怕均与《春秋》的影响有关。

《春秋》是现存中国第一部编年史著作，在中国古代史学史、思想史、经学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中国传统文化、齐鲁文化的基石。它虽然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文学作品，更不是小说，但作为小说源头之一的叙事性作品，对后世小说文体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二、《左传》的作者及成书年代

《左传》，也称《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汉代也有人称为《春秋古文》。最早著录此书的是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春秋类："左氏传三十卷。"班固自注作者为"左丘明，鲁太史。"关于《左传》的来历，《汉书·楚元王传》附《刘歆传》曰："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时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经传。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① 《刘歆传》所引刘歆移书责让太常博士，其中亦曰："《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伏而未发。"与刘歆约略同时的王充《论衡·案书篇》亦曰：

> 《春秋左氏传》者，盖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时，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宫，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

①班固：《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二十五史》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51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传》也。公羊高、穀梁寘、胡毋氏皆传《春秋》，各门异户，独《左氏传》为近得实。何以验之？《礼记》造于孔子之堂，太史公，汉之通人也，《左氏》之言与二书合；公羊高、穀梁寘、胡毋氏不相合。又诸家去孔子远，远不如近，闻不如见。刘子政玩弄《左氏》，童仆妻子皆呻吟之。光武皇帝之时,陈元、范叔上书,连属条事是非,《左氏》遂立。然而许慎《说文解字序》则曰：“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仓献《春秋左氏传》。’① “《释文叙录》述《左传》传授甚详，亦有荀况传张苍，张苍传贾谊之言。但《汉书·张苍传》、《贾谊传》及《儒林传》均不记《左传》之师承传授”。② 可见疑古派虽对孔壁书持怀疑态度，但《左传》来历的最大可能仍然是得自孔子壁中而后藏之秘府,刘歆校勘秘书,“引传文以解经”,遂得传世。

关于《左传》的作者，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一直没有定论，至今尚然。厘而类之，大致有三种说法：

1. 认为作者是鲁国的左丘明。此说以司马迁、班固等著名历史学家为代表。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曰：

>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①许慎：《说文解字序》，中华书局 1963年版，第 315 页。
②蒋伯潜：《十三经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437 页。

明指作者为左丘明，且明指左丘明为孔子同时代人，明指《左传》为传《春秋》之作，成书年代在《春秋》之后。班固不但于《汉书·艺文志》著录“左氏传三十卷”，自注其作者为“左丘明，鲁太史”，且于春秋类序中说：

>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

二人虽均明指《左传》作者为左丘明，丘明为孔子同时代人，《左传》成书在《春秋》之后，但仔细比勘，亦略有差异：一是《汉志》称左丘明与孔子同观鲁之史记，《史记》未言及。二是《汉志》称《左传》乃论《春秋》本事而作传，以明孔子不以空言说经，而《史记》则但云“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三是《汉志》明言《春秋》贬损当时人物，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解释了《春秋》言简意赅及《左传》成书后久未行世的原因，而《史记》未及之。两相比较，似乎班固探讨更为深人。另《论语·公冶长》载：“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

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可见左丘明之为人、时代及与孔子的关系。自汉至清，此说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故《四库全书总目》说：“自刘向、刘歆、桓谭、班固，皆以《春秋传》出左丘明，左丘明受经于孔子；魏晋以来，儒者更无异议。至唐赵匡，始谓左氏非丘明，盖欲攻传之不合经，必先攻作传之人，非受经于孔子……”

2. 认为左氏并非左丘明，作者非受经于孔子，《左传》并非为传《春秋》而作。据《四库全书总目》，首倡此说者为唐代赵匡，“宋元诸儒，相继并起。”王安石有《春秋解》一卷，“证左氏非丘明者十一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谓出依托，且其书已佚）朱熹谓“虞不腊矣”为秦人语，作者应为秦人。叶梦得谓“纪事终于智伯，当为六国时人”①。而《四库全书总目》乃引张守正、阎若璩之考证，一一辩驳，“仍定为左丘明作”。郑樵《六经奥论》卷四“左氏非丘明辨”更从《左传》叙事至襄子卒、上溯获麟、在孔子卒后 78 年等八个方面力证作者为六国时人。蒋伯潜《十三经概论》更综合前人之说，称“故《左传》作者是否左丘明，左丘明是否与孔子同时，是否为孔子弟子，终属疑问也”。然通观持否定或怀疑左丘明之说的理由，无非是《左传》中载有后世的内容。意古籍流传，时代久远，后人窜入的可能性极大。

3. 认为《左传》为刘歆伪作，成书于西汉末年。首倡此说者为清末康有为。他在《新学伪经考·汉书艺文志辨伪》中根据《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均有“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记载，认为左氏所著乃《国语》而并非《左

①说见蒋伯潜《十三经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438 页。

传》。今传《左传》，是刘歆将不编年的《国语》系以年月，与《春秋》相比附，改编而成。其后，崔适的《史记探源》、《春秋复始》，钱玄同的《重论今古文学问题》（《古史辨》第五册上编），徐仁甫的《左传疏证》等又对此说作了补充。但如前所述，如称刘歆“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是合情合理的，如谓其造作伪书以欺世盗名，则何敢向哀帝提出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且“诸博士不肯置对，歆乃移书责让之”。

在以上三种说法中，鲁国左丘明说始终占主导地位。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似乎很难动摇。通过以上论述，可见《左传》的作者为鲁国的左丘明，成书年代当在春秋战国之际，原书是在《春秋》影响下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因涉及当时权贵，所以“隐其书而不宣”，秦灭之后辗转入汉秘府，后经刘歆整理，且“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成为后来流传于世的《左传》。这样，《左传》为先秦古籍，经后人整理（当然便难免掺与附益），属齐鲁文化的范畴，当是可以断定的。

三、《左传》的题材和内容

《左传》是《春秋》三传之一，自汉代以来，一直是儒家的重要经典，被儒家学者视为解经之作。然详读《公羊传》、《穀梁传》就会发现，《左传》之题材与内容，则的确如蒋伯潜所言：“前二者详于解释经文之义例，为训诂之传；后者详于叙经文所书之事实，为记载之传。圣人所作曰‘经’，贤人所述以释经旨者曰‘传’。故《公羊》《穀梁》为‘传’之正体；《左传》则是‘史传’，非‘经传’之传之正体也。’① 其实，

①蒋伯潜：《十三经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427 页。

宋代的叶梦得早就说过：“《左传》传事不传义，是以详于史，而事未必实；《公》、《穀》传义不传事，是以详于经，而义未必当。① 就更进一步涉及到《左传》在题材和内容方面的小说特征。

实际上，《左传》也可以分记事和解经两部分。如隐公元年，述“郑伯克段于鄢”之经过及前因后果，显然是记事；而“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不言出奔，难之也”一段，则显然是解经。解经部分毫无疑问确是为传《春秋》而作，可能是后世儒者“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的产物。记事部分有许多地方与《春秋》经文相左。如隐公元年，“惠公元妃孟子……”一节，追溯至隐公元年之前，与经文无涉；桓公二年，“初，晋穆侯夫人姜氏以条之役生太子……”一节，已追叙之隐公元年前 60 年，经文中绝无其事；《春秋》绝笔于获麟，而《左传》结于获麟后 28 年等等，均为“无经之传”；可见本来是一部独立的史书（《汉书·刘歆传》称太常博士云《左传》不传《春秋》；唐刘知几《史通》不但列《惑经》、《申左》二篇，且于《六家篇》中并列《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史记》、《汉书》，亦可证《左传》原是一部独立的史书）。很可能是根据周王朝及各诸侯国的史料编撰而成，所以全书的文体、风格并不一致。总览《左传》之记事，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记事简短，但年月日却明确详悉。如隐公元年：“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书爵。曰仪父，贵之也。”“夏，四月，费伯帅师城郎（鲁

①转引自蒋伯潜《十三经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428 页。

邑，在今山东鱼台县东）。不书，非公命也。”诸如此类，很可能是取自史官的实录。这类记事的特点是文词简短，记事明确，没有铺叙描写。另一类则叙事详尽，但时间观念却往往比较模糊，或者根本不书日月。如隐公元年，《春秋》经文书：“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时间非常清楚而叙事非常简短，但《左传》就不同了，开头只记“初，郑武公娶于申……”，时间便十分模糊。接下来叙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恶庄公爱共叔段的原因，由匿爱而引发的矛盾，城京，段将袭郑，庄公伐京，克段于鄢及庄公母子由结仇到释怨的详细经过，中间除承袭经文的一句“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涉及具体时间外，其余均没有时间记录。通观《左传》，那些文学色彩较强的篇章，多属此类。对于这一现象，赵光贤曾论证说：“这些记事显然都不是史官的记录，而是经过文人加工过的，写作时间距离史事发生已远，明确时间没有保存下来，而且也不能追忆，只好付之缺如。正因为如此，记事者得以铺张夸大，不免有失实之处。’① 《左传》之小说因素,多数在这类记事作品中。从题材和内容方面看，其小说因素约略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左传》以大量的篇幅记叙了春秋时期各国诸侯建功立业的伟大业绩。这从被后世称为“春秋五霸”的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的记载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如齐桓公在位 43 年，自鲁庄公九年至鲁僖公十七年。而《左传》叙事，却从庄公八年连称、管至父杀齐襄公立公孙

①赵光贤：《〈左传〉编撰考(下)》，《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 1981年第 2 期

无知，齐国大乱，管仲奉公子纠奔鲁，鲍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开始，交代了人物之间的关系。庄公九年，小白（桓公）先人齐即位，败鲁师于乾时，迫鲁杀公子纠，交出管仲。鲍叔向桓公推荐管仲，桓公不计前嫌，任之为卿，显露出一个伟大政治家的博大胸襟。是后，庄公十年，记齐侵鲁，败于长勺。庄公十三年，记齐桓公与宋、陈、蔡、邾会于北杏，以平宋乱；遂人不至，齐灭遂。庄公十五年，复会，齐始霸。庄公十六年，齐又与鲁、宋等会于幽。庄公二十七年，周王使召伯赐齐桓公命为侯伯，且请代卫以讨其拥立子颓之罪。二十八年，败卫，救郑。三十一年，献戎捷。三十二年，以楚伐郑，请会诸侯。闵公元年，救邢，败狄人。二年，发兵戍卫。僖公元年，率诸侯救邢，迁邢于夷仪，为筑城；秋，与宋、朱等盟于贯。二年，率诸侯助卫城楚丘，与江、黄会盟。三年，为阳谷之会。四年，会鲁、宋、陈、卫、郑等诸侯之师攻蔡，伐楚，与屈完盟于召陵而还。五年，合诸侯，会王世子于首止，谋定其位而宁周。六年，合诸侯以伐郑，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七年，伐郑，郑听命于齐。八年，与诸侯盟于洮，周襄王定位而后为惠王发丧。九年，与诸侯盟于葵丘。十二年，使管仲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礼飨之。十三年，与诸侯会于咸。十五年，与诸侯盟于牡丘，发兵救徐。十六年，戎攻周，齐征诸侯而戍周，与诸侯会于淮。十七年，桓公卒。近臣易牙与寺貂（竖刁）因内宠以杀群吏，立公子无亏，齐国大乱。通观《左传》对齐桓公事迹的记叙，不但他尊周室，攘夷狄，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终其身为盟主的赫赫功业历历在目，且用贤（管仲）而霸、用佞（易牙、竖刁）而衰的用意亦十分明显。这种题材和内容，不但影响了后世史学，相信每一位了解《三国演义》等历史小

说的人也肯定会清楚其对小说的影响。另如晋文公重耳，虽然在位只有短短的九年，但有关他的经历及其他活动的记事却延续了 38 年。晋国内乱，重耳出亡，流落他乡 19 年，备尝艰辛，终于从一个不谙世事的贵族公子锻炼成了一名阅历丰富的政治家。在秦穆公帮助下重返晋国，励精图治，终于在城濮之战中确立了他的霸主地位。类似的题材和内容在《左传》中不胜枚举，对后世小说尤其是历史演义小说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

第二，《左传》也以史家直笔毫不留情地记叙了统治阶级内部不近人情的矛盾和斗争，揭露了统治阶级腐败分子的贪婪残暴、穷奢极欲和荒淫误国。在这些政治斗争中，有天子与诸侯之争，如隐公三年周桓王与郑伯交恶导致的“周郑交质”；桓公五年，周桓王夺郑伯政，庄公不朝，周与蔡、卫、陈攻郑，郑祝聃射王中肩等等。有诸侯国君臣之争，如隐公四年卫州吁弑卫桓公而自立，导致卫国大乱；宣公二年晋灵公欲杀赵盾、盾出奔未出境而赵穿弑灵公，太史董狐书“赵盾弑其君”等等。有封建贵族家庭的父子矛盾，如文公十八年莒纪公欲废太子仆，仆与国人弑其父而奔鲁；宣公四年郑公子归生为食黿之故而弑其父灵公等等。有兄弟矛盾，如隐公元年之“郑伯克段于鄢”；庄公八年、九年齐国之乱，桓公小白迫鲁杀庶兄公子纠等等。其他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及由此而引发的政变杀戮亦举不胜举。此类题材和内容不但引起了后世史学家的关注，也影响了后世小说，为小说家尤其是历史小说家所关注。至于记叙统治阶级腐败分子穷奢极欲、荒淫误国的内容，就更加丰富生动。如桓公十六年，记卫宣公先烝于夷姜而生急子；又为右公子娶于齐，见齐女美而自纳之，生寿及朔，卒致内乱。又如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